



[增订本]

# Reform: Now at a Critical Point

## 改革：

吴敬琏著

目前在经济改革方面需要重点解决  
的问题有四个：

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调整所有制结构；  
尽快解决私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  
市场经济的支持性系统亟待建立；  
要确立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要确立法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增订本)/吴敬琏著. - 2 版.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3 (2001.10 重印) (2002.3  
重印)

(经济学家手札)

ISBN 7-108-01700-8

I . 改… II . 吴… III .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9978 号

丛书策划 贾宝兰

责任编辑 贾宝兰

封面设计 张 红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春辰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2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字 数 302 千字

印 数 40,001—50,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 目 录

序 言 .....	1
-----------	---

## 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

正本清源，分清是非 .....	7
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公正 + 市场经济 .....	13
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一着 .....	23
改革二十年感言 .....	30
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 .....	34
冲破沉闷空气，争取企业改革的重大突破 .....	46
加紧改革，迎接入世 .....	51
机遇来自正确地应对挑战 .....	56
回顾与前瞻 .....	59
新形势下政府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	65
经济走势出现转机，还须加大改革力度 .....	76
此计划非彼计划 .....	83

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	88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96

## 国有部门：改组与改革

国有经济：十个指头按不住几百个跳蚤	107
从国企改革到国有经济战略改组	111
别打股份合作制的歪主意	129
国有经济改组应是市场行为	131
剖析国企“无老板”现象	135
捏紧拳头 背水一战	137
——关于国家石油公司重组改制的对话	
“新三会”与“老三会”	144
建设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现代企业	149
——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案例分析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和改善的途径	157

## 亮点在哪里：民间企业与高技术产业

解决再就业问题要多做“加法”	171
民企创业：“红黑两道”走不得	178
经济形势与中小企业的发展	181
激发企业活力，启动民间投资	196
答民营企业家问	203
发展中小企业	206

发展多种民间商业 .....	221
制度重于技术 .....	225
——论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	
中国怎样才能有自己的硅谷？ .....	237

## **资本市场：发展与泡沫**

培育资本市场：关键何在？ .....	253
明晰产权关系，强化内部监管 .....	258
实现保险业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 .....	262
金融业是做什么的 .....	264
股东不是可以任意鱼肉的小民 .....	270
确立股市投资者主权 .....	272
打破幻想，抑制癫狂 .....	276
互联网：要发展还是要泡沫 .....	279
网络经济与股市泡沫 .....	284
抑制股市泡沫，支持产业创新 .....	287
证券市场不能黑 .....	295

## **人·事·书**

我与顾准的交往 .....	307
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论争 .....	318
一位职业经理人的人生感悟 .....	340
腐败寻根 .....	343

政府与市场作用消长的编年史 .....	347
我在改革的岁月里 .....	352
电子商务的实战手册 .....	407
让经济学走到百姓中去 .....	410
高擎科学与人文精神的旗帜 .....	412
学会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 .....	417
附 录:	
感受吴敬琏 .....	423

# 序　　言

1997 年，三联书店为我出了一本杂文集，题目叫做《何处寻求大智慧》。我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前言》，说是 20 世纪初期以来经济学文字变得愈来愈抽象化和形式化了，而中国经济学家作为改革的马前卒，常常需要写一些不符合经济学学术规范的杂文。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引用了经济学是“沉闷的科学”这样一种说法，并且注明“沉闷的科学”是 *boring science* 的译文。不久以后才发现，在这里，我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为我指出这一错误的，是我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思勤（Carl Riskin）教授。我在那篇《前言》里用的 *boring science* 一词，其实应该是 *dismal science*。在英特网上查阅有关资料，才知道 *dismal science* 这个词是英国 19 世纪的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创造的，他因此而在经济思想史上留名。*dismal science* 应当译为“令人沮丧的科学”。所谓“令人沮丧”，一般从两个层次上来理解：其一是因为，19 世纪转轨时期英国社会矛盾丛生，面对着暗淡的现实，经济学却提不出拯救的良方；其二是很多人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人们无法餍足的欲望，由于受到资源稀缺性的制约，经济学永远不可能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随着现代化展开的热烈的经济生活，使经济学被一些人目为“显学”，甚至有人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dismal science 的表面含意早已不在，它只是作为一个符号留在世界上，以致有一个经济网站诙谐地以它命名，不过内容则五光十色、丰富多彩，不曾有一点沉闷和沮丧的迹象。

然而，当我在 2000 年年初着手编这本集子时，心情确实有几分沉闷和沮丧。首先，实行计划经济几十年，使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浪费了许多时间。目前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很多，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基础的国有企业经过 20 年改革仍然没有取得成功。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长时期没有取得突破，从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可以说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国有经济效益未见根本好转，加上国内外其他因素的作用，使国民经济在 1997 年以后的几年中一直处于不振的状态之中。特别使人丧气的是，我们不得不继续谈论五年前我在《何处寻求大智慧》中就已提出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日益猖獗的腐败、经济关系的混乱与失范、改革过程中财产再分配的严重不公，以及金融诈骗、股市泡沫，公权不彰，法治不行等等。其次，经济学在改革中的作用发挥得怎么样？我总感到，在这迫切需要经济学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推动改革前进和在改革过程中尽力保护大众利益的时候，我们做得很不够。这固然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也与我们自身的努力不够有关。所谓努力不够，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学识方面的，从国际范围内看，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经济学经历了好几次革命，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家努力探索取得了新的成就。在信息、激励等问题上现代经济学都有了新的发展。对于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来说，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原理

和工具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还是继续沿用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和思想方法去为维护旧体制作论证，或是片面地运用经济学中某个论点去为某些狭隘的利益服务，而没有对现代经济学的整体进行学习和运用，就会产生严重的误导和危害。另一方面的缺点，则是没有能够在改革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中实现自己作为社会良知的职能。其中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虽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产权规则是市场经济一切游戏规则的基础，在 1999 年修改宪法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却没有能够形成经济学家的集体的声音，将公民的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写入宪法修正案。

以上种种忧思促使我去探寻中国经济中的亮点。在国民经济普遍不振的氛围中，1998 年我首先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台州地区看到了这样的亮点。那里的市场繁荣、增长强劲、就业状况良好、社会稳定的秘密，在于非国有经济有了广大的发展，在全国率先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我看到，在一系列地区，改革 20 年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从小到大，到 20 世纪的 90 年代后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因此在近年的文章里，除了抨击时弊、提出改革改组国有经济的方向和具体措施之外，有相当大的篇幅是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启中国经济的亮点的。令人欣慰的是，目前这种认识成为愈来愈多的人的共识，开启“亮点”的事业也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努力推进改革，促进创建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局面的建立，为民主、文明、富强的中国准备坚实的基础，是一个确实值得为之付出全部精力的伟大事业。中国的命运和未来取决于这一事业的进展。因此，我以《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作为这本文集的书名。

本书收集的是最近几年杂文形式的文论。我由衷地希望这有助于更多的人参与到推进改革的事业中来，只有全体人民的觉悟和支持，中国经济才会真正亮起来，也才能真正扫除经济和经济学头上的沉闷和沮丧。

吴敬琏

2000年12月31日

# **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



# 正本清源，分清是非

为了在转轨时期的大变局中找到自己的正确方位，思想理论界人士需要对这个变革过程的基本态势和主要趋势有清晰的认识。

马克思和列宁曾说过，德国和俄国既受资本主义发达之苦，更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而一百多年来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难题，也可以说是受市场经济不发达之苦远甚于市场经济发达之苦。这和发达国家的情况有原则上的不同。在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暴露出种种弊端，需要寻找适当的途径来加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由此提出的背景。中国的现代化所要处理的问题远比发达国家复杂得多。

正因为旧中国市场经济不发达，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便很容易走向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曾经一度出现过好的势头，可是不久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权急速地走向了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中国的口号。这个

---

\* 原载《读书》杂志 2001 年第 7 期。

口号把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只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就推翻了当时看起来十分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按照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计划，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相当长历史时期中的任务，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但是恢复时期刚刚结束，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否定了党的七大确定的纲领，以俄国为师，急速转向在国有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实行集权的计划经济，以为采用集中计划动员和配置资源，将使中国能够在很短的时期内实现国家工业化，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殊不知集权计划经济不但由于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使中国的工业化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人民生活水平在1957—1977年长达20年的时期中几乎没有什么提高；而且由于抑制了人民群众创造力和当家作主权利的发挥，官僚主义和腐败也逐步滋生。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竟然落到了崩溃的边缘，从而使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问题在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也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离开建立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 crony capitalism（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有些人以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对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国家仍然在早期市场经济权力资本支配的陷阱中，或者叫做坏的市场经济中挣扎。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弄得不好，也会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发生这种情

况概率很高的原因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往往有方便的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环境，抵制权力资本的能力也许会强一些，但在后进国家通常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加之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战略，双重体制并存，更增加了“权力搅买卖”、进行寻租活动的可能。这样，腐败问题在 80 年代中期就已经变得相当突出了。虽然此后领导上一再提出了“肃贪反腐”的要求，但是腐败蔓延的势头并没有被扼制住。

在打着市场化改革的旗号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盛行的情况下，另外一个极端的思潮也就有了一定的市场，这就是鼓吹向旧体制开倒车。有的人认为，当前我们社会中出现的这些腐败行为和丑恶现象，都是由市场经济的本性所决定的。他们由此论证，应当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文革”时代的“美好往日”去。也有的身在海外的学者，不理解这些问题的主要来源并不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而在于市场化改革尚未到位，将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与自己较为熟悉的发达市场经济的弊病相类比，从“左”的方面介入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支持与市场化改革相对立的主张。

这样一来，从 80 年代中期起，逐渐可以看到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支持建立坏的市场经济；另一端是主张回到集权计划经济和“左”的政策。正像我在 1999 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所说，这两者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互相加强。于是问题变得十分复杂。这两条道路都是歧路。由于制度

变迁“路径依赖”的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愈远，退出的成本就愈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锁定，就会像诺斯所说，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振荡，就很难退出了。

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有社会责任感的思想理论界人士应当明辨是非，经常考虑自己的工作是否有利于阻止在转轨期间经常发生的以权谋私和掠夺大众的行为，促进好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以便为人民造福。

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问题的是非曲直早已昭然若揭，作出正确的结论并不需要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素养，但还是作出了有悖常理的判断和错误的决策，这往往是与论者的利益取向相联系的。比如在改革方案的选择上隐含着是选择有利于寻租活动的方案还是选择能够铲除寻租条件的方案。道理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有些人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论据来维护前者和反对后者。例如 80 年代后期关于要不要放开价格的争论，以及最近几年关于股票上市制度的争论，在我看来大体上都属于这种情况。

但是也有不少问题的是非并不是那样分明。这时，就需要运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去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例如，人们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的“效率与平等存在替换关系”的原理，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种认为我们还是一个穷国，只能考虑提高效率，而不应兼顾平等；另一种认为分配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根本性的要求，因此应当提出平等就是一切的原则，而不能把效率放在重要地位。其实读过奥肯的《平等与效率》的人都知道他认为平等可以从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两个角度去观察。他所说的与效率有着替换关系（负相关关系）的平等，指的是结果的平等。至于机会的